



社会翻译学研究： 理论、视角与方法

SOCIO-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Perspectives and Methods

王洪涛 主编

Edited by WANG Hongtao

南开大学出版社

Nankai University Press

4019
2002

社会翻译学研究：理论、 视角与方法

**Socio-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Perspectives and Methods**

王洪涛 主编

Edited by WANG Hongtao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津

Nankai University Press

Tianji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翻译学研究：理论、视角与方法 / 王洪涛主编.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7.1
ISBN 978-7-310-05287-5

I. ①社… II. ①王… III. ①翻译学—研究 IV.
①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94463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刘立松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300071

营销部电话：(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022)23502200

*

天津午阳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230×155 毫米 16 开本 23 印张 2 插页 328 千字

定价：58.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电话：(022)23507125

序 言

Preface

筌路蓝缕，锲而不舍

——关于我国当下社会翻译学的可贵探索

A Critique of the Pioneering Research in
Socio-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王宏印

WANG Hongyin

一门学科的诞生，可以有不同的学科标志，诸如重要人物的出现，重要事件的发生，重要论著的出版等。如果单从出版物的角度来看，则可以有不同的形式和机遇。以下的讨论主要按照出版物的分类，围绕翻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建立和发展来展开，但不局限于具体的学科，即不限于社会翻译学或翻译社会学本身，而是围绕这些学科的诞生和建设进行讨论。

第一种，论文。1972年，霍姆斯的会议论文《翻译学的名与实》，实际上宣布了现代翻译学的诞生，因为这篇论文不仅论证了翻译学的名义，考察了该学科的实际情况，而且为翻译学科指出了较为宏伟的学科关系并制定了长远的发展规划。对于翻译学来说，这无疑是一个福音。就一篇论文对于一门学科的诞生和发展而言，也是十分理想和典型的情况，当然这种论文不同于一般的学术论文，即不

是一般窄而深的专门论题和纯粹的个人见解可以比拟和完成的。然而论文的优点在于短平快，发布迅速，涉及面广，而缺点在于篇幅所限，不能做出完整而系统的论述，甚至格式所限，难以有随意发挥的余地和近乎周全的细节考虑。当然，有些论文也追求时效，这就具有了新闻的性质。所以，霍姆斯制定的翻译学发展的学科关系表，至今并没有得到实现，换言之，翻译学是否可能按照一个人的学科体系和规划目标来发展和完成自身的学科建设，则是一个留待后人解决和讨论的问题。

实际上，受其影响，我国翻译学界的许多理论家，都做过类似的尝试，以刘宓庆和杨自俭最具有代表性，或者修改霍姆斯的方案，或者提出一种替代性的解决方案，但也会遇到类似的命运。这或许是因为，虽然人类翻译的历史悠久，但翻译学却是一个后起的学科，诞生在 20 世纪这个新兴学科不断涌现，人类知识爆炸，学科分化频繁的时代。也许人们不满足于翻译学科的落后状态，觉得翻译既然有了这么多的资料、这么长的历史，为何不能马上建立一门翻译学呢？再加上比较文学的极速发展和翻译的学科焦虑，不少人急于建立一个可以与之较劲的翻译学科（有关翻译学和比较文学谁包括谁的争论就是明证），致使学科建设走到了理论发展的前面，走到了翻译实践（相当于科学实验）的前面。极而言之，这也许是一种本末倒置的现象，但对于许多有识之士而言，却一度是激动人心，而且富于推动作用的现象。

第二种，教材。以现代语言学的诞生为例，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虽然是以听课笔记的形式出版的，但保留了当年索绪尔讲课的全部内容、章节安排和叙述思路，是完整的教材和讲课的记录。教材的优势在于原理性、系统性、可接受性三者的完美统一。教材的编写者必须是一个十分全面的学者，他有教学的经验、条件和完整阐述一门学科的能力和耐心，能够遵循一定的讲授顺序进而抵达最终的学科目标。另外，还需要等到一门学科可以成熟的条件已经具备，它的标志性成果才有可能以完美的教材的形式出现。在西方哲学近乎开端的部分，在智者派的思想片段和苏格拉底的述而不作与柏拉图的对话

录之后，亚里士多德的许多哲学著作有系统的论证和讲课的逻辑，所以具有教科书的性质。但哲学却是观点性质的学问（哲学史也应做同样观，只不过它要批判地介绍各种哲学而不能坚持一种哲学，但这种批判本身，已经是哲学观点，且不用说哲学史观，也不是统一的），至今并没有统一的教材，所谓哲学原理一类书籍，未尝不是对哲学做了教条化的解释，或者就是一孔之见，以学派哲学冒充了哲学的全貌或真理。资料性大于观点性的文学，其文学史或文学原理也是如此。

从人类的语言研究古已有之的角度来看，索绪尔具有原理性的语言学论述，出现在语言研究的中间阶段或企图汇集全球主要语言谱系的阶段（人们几乎忘记了索绪尔在印欧语系的研究中做出的卓越贡献和重要论文，只记得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了）。在这种情况下，索绪尔完成了有把零散的研究按照结构主义的原理组成系统知识的历史任务，说他只是宣布了符号学意义上的语言学的诞生，其实是不够的。其后，符号学成为单独的学科，而现代语言学的发展，更是索绪尔所不可能预料的（至少没有在其区分语言和言语的基础上把语言作为研究对象，倒是把言语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了，而话语分析和话语类型学甚至成为独立的学科）。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古代西方普遍语法的哲学追求的现代翻版，而认知语言学走了心理学的经验科学的道路，系统功能语法则社会学、文化学的路子，特别是和功能主义文化学派关系密切。统一的语言学，并没有发展出来，事实上，也不可能存在。奇怪的是，本来应当以现代语言学为基础的现代翻译学，并没有以索绪尔的符号学语言学原理作为其学科基础或理论来源，甚至也很少以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或者认知语言学和系统功能语言学作为其理论参照。假如说卡特福特的语言学翻译理论坚持了语言学的道路还值得一提的话，它却是极具尝试性的、奠基于语言学的语言要素分析的对立理论，而且是简单的对应关系论。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发人深思的现象。

第三种，专著。以心理学为例，在心理学的机能主义、构造主义等早期学说纷纷产生影响之后，虽然有了詹姆士的《心理学原理》（作为系统论述心理学理论的专著或教材），但真正的心理学（对社会和人

生产生重大影响的心理學)及其分支學科與應用學科的建立和發展契機,却是奠基在弗洛伊德的《釋夢》、皮亞杰的《發生認識論原理》以及馬斯洛的《動機和人格》等劃時代的心理學大師的專著上的。沒有這些心理學專著的問世,心理學就只能停留在早期的少數思想家的哲學思辨和學科虛構的夢呓中,或者限于物理學、生理學、神經學和刺激反應一類常識性知識的分章節編寫而成的教材上(即所謂的普通心理學),而不可能得到長足的發展和深入的研究,也不可能分化出發展心理學、人格心理學、精神分析學派等學科和流派,換言之,也就不可能有現代實證科學基礎上的實驗心理學和人文主義心理學的分野(語言學的歐陸學派和英美分析學派,也有類似的分化傾向)。也正因为如此,事實上不可能有統一的心理學,也就不可能或不應該有心理學原理一類教科書把心理學規定在一個固定的思想模式里,或者統一在一個前后一致的邏輯的理論框架里。

在世紀之交中國翻譯學建設的熱潮中,謝天振教授的《譯介學》和本人的《中國傳統譯論經典詮釋》可算作專著的代。事實上,《中國傳統譯論經典詮釋》在當時西方翻譯理論大行其道的形勢下,可謂是反其道而行之。它以西方哲學為潛在的公理體系和論述高度,以王國維等清末學者和“五四”學人西學治國學的理论分析方法為參照,有鑒于中國古典文論的現代轉換的失敗經驗,轉而對中國自己的古典譯學思想加以發掘,做了脫胎換骨的轉換工作。其后筆者轉向的《文學翻譯批評概論》和《文學翻譯批評論稿》則是文學學知識在翻譯批評學科建構上的嘗試,加上自己對於文學翻譯批評現象的批評和本體與方法的反思和闡發,但筆者認為,文學翻譯批評只是一種批評,和文學批評一樣,並不應當成為獨立的學科,所以也就無意於建立一種以“學”命名的學科。再往後的《新譯學論稿》則是分欄目和學科領域的個人學術論文集而非專著寫作的性質了。

相比之下,具有比較文學背景和翻譯學知識的《譯介學》則以極快的速度,將國外正在興起的譯介學理論和重要觀點匯集貫通,加以系統化的整理和條理性的說明,產生了原理性和指導性兼有的專著作用,糾正了傳統翻譯學的文本中心主義和以評判標準為基點的研究思

路,但其更为重大的成果,则在于《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1898-1949)》和《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等汇集大量资料和历史考察性质的后期成果中。这和比较文学的演进路径有很多相似之处。有趣的是,以视野和观点见长,始终不能脱离资料和分析方法的比较文学,其开创性和标志性成果,原本也是以论文集的形式著称于世,而非一本个人研究专著或一本资料和观点汇集的教材可以成就的。这与比较文学本身所需的巨大的资料覆盖和体系建构有关,因为一个人甚或一个组织难以完成这样的工作量,更不用说这还需要这个人精通各种语言,精通世界文学,这几乎是一种不可能完成的学科建构努力了。唯一要提到的是世界级的比较文学和文学评论大师韦勒克,他的不懈努力和等身著作是有目共睹的,但他得益于欧洲文学的本土的经验积累和理论超脱以及美国文化的全球视野、活动能量与现代技术的支持,而对于欧美文学经典以外的其他文学的知识局限,也是不言而喻的。

追根溯源,“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说法最早见于韦勒克与沃伦(Wellek & Warren)1949年合著的《文学理论》(*Theory of Literature*)一书。书中,韦勒克与沃伦将那些对文学作品与传记、心理、社会等外在因素之间关系的研究归为“文学的外部研究”,而把那些对文学作品自身形式与结构的研究视作“文学的内部研究”(Wellek & Warren, 1949)。自此以后,韦勒克与沃伦所做的这个区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就成为以新批评、结构主义为代表的形式主义文论排斥传统社会历史批评,标举作品本体论、文本内部研究的一种理据。(王洪涛,2016: 9;同时见本书第8页)^①

发人深思的是,我们对于韦勒克的研究成果和独特方法缺少精深的理解和有效的借鉴,倒是把“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必要区

^① 序言引文均出自王洪涛的《“社会翻译学”研究:考辨与反思》一文(见《中国翻译》2016年第4期第6-13页,同时见本书第1-19页“绪论”部分,而后者对前者稍有修订)。以下仅注明页码,不再详细注明出处。

分作为教条和常识接受下来（就像我们把直译与意译、归化与异化作为概念成对地接受下来一样），以至于这些“概念”成为拒绝接受新思想的陈旧武器，甚至在对付文化转向和翻译学的文化研究之后，又一次成为反对社会翻译学学科建设的理论立据。这不能不说是我们学习西学而不得其要领的悲哀，也导致了我們只知道占有资料而不产生思想大师的悲剧。值得庆幸的是，最近我个人得知，在新兴的社会翻译学领域，也出现了专著作为标志性的研究成果。

2014年，俄裔英国翻译研究学者谢尔盖·图勒涅夫（Sergey Tyulenev）出版了专著《翻译与社会导论》（*Translation and Society: An Introduction*），全面探讨翻译与社会文化的互动以及各种翻译研究的社会学模式，代表了西方社会学路径翻译研究的最新进展。（王洪涛，2016：6；同时见本书第2页）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将社会与翻译并列的提法，反映了他对于二者关系的双向互动的辩证把握，以及不断然采用单一方向或单一方面的决定论立场的达观思路。其标题中作为“导论”的审慎提法，并没有着意贴上“社会翻译学”或“翻译社会学”的固定标签，这也值得我们借鉴。我们希望，国内对于这本极为重要的专著首先要有译介，抓紧进行重点的述评和研究，然后，再结合中国社会翻译学的实际和目前已经取得的进展，加上作者自己独特的认识和系统化的整理，尽快地写出自己的社会翻译学专著来。

第四种，论文集。论文集是介于单篇论文和学术专著之间的出版物，其优势是专业性强、容量大、反应快。特别是在一个学科的科学共同体活动频繁、各种理论纷纷出笼、各抒己见的形势下，作为一个新兴学科的地区性、阶段性成果的体现，论文集几乎是最有效的方式。一般的论文集，都是专业会议和专家约稿的结果，所以专业性比较强，容量在几十篇不等，动辄几十万字，不亚于长篇小说，有专业组织的推介，几个月之内可以出版，出版周期短，上市快，读者群也集中，所以收效也快。在现代学科发展的多学科观照且相互渗透的学术大势

下,地区性的专业会议、专题讨论的阶段性的成果反应较快、较有代表性,但除非是高水平的国际会议,不然很难有全方位的论文收集和全球性的出版发行效果。与教材的保守性、稳定性相比,专著的系统性和个体性观点,在论文集中表现得不是很明显,倒是单篇论文的快速反应和个人观点,尤其在研究的资料性和方法与效果方面(有的可以上升为观点和理论),具有突出的表现。最突出的特点,是论文集是现代学科诞生和发展的标志性出版物,具有其发行渠道。论文集的质量取决于作者、会议和主编的水平(好的论文集分栏目,有评论,有附录),一般是三者综合实力的体现。

在我国翻译学建设的过程中,除了国外的翻译会议论文集之外,港台学者编写的论文集(中文、英文或中英对照),曾经起着重要的推介和传播作用。而大陆学者编写的论文集,例如,罗新璋编写的综合中国历代翻译理论精华的《翻译论集》及其修订本,杨自俭编写的荟萃当代翻译学科建设会议论文与翻译研究成果的《译学新探》和《翻译新论》,张柏然和许钧主编的从各种渠道收集翻译学论文精华的《面向21世纪的译学研究》等,也都曾起过巨大的推动作用。随着翻译学建设进入教学和课堂,西方翻译学理论系列丛书的出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等几套原版引进丛书的出版),似乎进入了低潮,加之学术成果评估不包括论文集,只算单篇论文(这本身就是奇怪的二律背反或自相矛盾),贬低专著,忽视教材,人们对于学科建设的兴趣日益变得淡漠,翻译学科的论文集也就很少见了。中国文化典籍翻译研究会的会刊《典籍英译》现改为《典籍翻译》,还在如期出版,每一次会议都有论文集,这种惨淡经营,可以说是这一传统的延续。

在这种学术形势下,在这种思想氛围里,在弟子王洪涛从牛津大学访学一年回国后的日子里,有机会几次讨论社会翻译学的建设问题,以及如何出版一本社会翻译学的论文集的问题,真是百感交集,但也令我陷入沉思。首先,我深深为王洪涛的锲而不舍的精神所感动,也为他多年来为这个新兴学科付出的努力、辛勤和智慧所感动。社会翻译学的研究,诚如洪涛本人所言,是他在完成博士论文的过程中,以

及在答辩和后续研究的过程中，就已经定下的学科目标，作为他自己为之奋斗的学术研究道路，我是很支持的。他的博士论文，虽然是以研究翻译研究学派为目的，但其中已经蕴含了对于翻译学的社会学研究的视角和兴趣。应当说，从一个学派的理论研究中能够敏锐地找到和抓住一个新兴学科的建设思路，并且锲而不舍，这样的研究者在我的众多博士生中还不多见。可以说，内外两个因素共同确定了这一学术定向。一个是翻译学的学科发展转向社会文化因素的客观局势所使然，一个是密切关注社会现实和当下努力的反响效果作为内在的学术动机所使然。这两个方面缺一不可，共生共长，终于开花结果了。

以下笔者就这两个方面的结合，主要是根据这个论文集本身的资料和思路，讲一下自己的认识和感受。

在社会翻译学已经有几十年发展，在国内外已经有不少论文发表，而作者个人也已经有系列论文发表的前提下，出版一本论文集，似乎是水到渠成的事情。王洪涛主编的论文集《社会翻译学研究：理论、视角与方法》，收集了国内十几年来在这个领域的主要论文，分为三个部分——本体论观照下的“社会翻译学的基础理论”，认识论观照下的“社会翻译学的研究视角”，方法论观照下的“社会翻译学的研究方法”，每一部分都有导言，可以说是一个体系完备、内容新颖的论文集。对于倡导和推进我国的社会翻译学学科建设，无疑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毋庸讳言，我首先关心的是国际上这一学科的发展情况和业已取得的主要成果的发表情况，幸而洪涛的论文集有一段完整的论述，比我从零星的阅读和交谈中获得的印象和记忆要详尽而准确，不妨引用如下：

2005年，翻译学杂志《译者》(*The Translator*)出版了一期专刊探讨布尔迪厄理论框架下翻译的社会学研究，使得社会学路径的翻译研究得到了国际翻译学界的广泛关注。2006年，皮姆(Anthony Pym)等学者编撰了《翻译的社会文化面面观》文集(*Sociocultural Aspects of Translating and Interpreting*)，翻译研究的社会学路径得到进一步拓展。2007年，沃夫(Michaela Wolf)

与弗卡里 (Alexandra Fukari) 合作编撰了《建构翻译社会学》文集 (*Constructing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倡导“翻译社会学”的理论建构。(王洪涛, 2016: 6 同时见本书第 2 页)

在我原来的设想中, 要是有条件, 可以先出一本国外同类学科论文集的选录本或组织专门的评论研究。如果有困难, 则可以把国外的主要论文, 加入到这个论文集中加以选登, 可以用中译文, 也可将原文加入附录, 但至少要有中文摘要或中文绪论加以概括介绍。但这一任务或许过于庞大琐碎, 在短期内几乎难以完成, 所以, 目前本论文集只是将西方社会翻译学的主要研究以英文文献目录的形式附在全文正文之后。这也有一种先睹为快或先入为主的资料价值, 至少弥补了只收国内论文的不足, 所以是值得肯定的。

我初步翻阅了这个论文集, 并重点查看了几篇, 对于所收论文的档次和内容, 无疑是认可的, 包括王洪涛自己在出国前后陆续发表的几篇, 虽然研究方法、内容和观点各有不同, 但都有很高的质量。在此基础上, 我仔细地阅读了洪涛撰写的绪论《“社会翻译学”研究: 考辨与反思》, 十分认可作者清晰的思路和理性的分析。作者的问题意识是第一个突出的印象, 作者将社会学路径的翻译研究概括为三个当下要解决的问题, 分别涉及社会学路径翻译研究的学科称谓、研究类型以及研究模式, 颇具专业和学科眼光。以下我结合自己的有限的认识和学科发展大势, 做一简要评论, 以期对相关问题有所讨论:

第一个问题, 关于学科称谓: “社会翻译学”与“翻译社会学”, 二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异同? 哪一种称谓指代当前社会学路径的翻译研究更为恰当? 作者把这一问题追溯到西方翻译研究学派奠基人詹姆斯·霍姆斯 (James Holmes) 1972 年在哥本哈根第三届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上宣读的《翻译学的名与实》一文。霍姆斯最初提出了“社会翻译学 (socio-translation studies)”与“翻译社会学 (translation sociology)”的说法, 并对其做了简要的阐释。但最终让两种称谓并列, 则给学界留下了一个模棱两可的难题。其实, 霍姆斯的意思是清楚的,

在学科发展本身还不曾出现明显分化并且或甲或乙谁占上风并不清晰的时候，他并不急于将两种倾向规定在一种无端或武断的思路，以免后人诟病。

在这种情况下，作者参考了国内外的有关研究，在借资语言学“语言社会学”与“社会语言学”二者分野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基本判断：

同理而言，社会翻译学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对翻译现象或翻译活动进行研究的学科，其切入角度主要是社会学，研究对象主要是翻译现象或翻译活动，研究目的主要是为了更好地认识翻译现象或翻译活动，因而其研究属性基本上是翻译学研究，换言之，可以将其视作翻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对照而言，翻译社会学是从翻译学的角度对社会现象或社会活动进行研究的学科，其切入角度主要是翻译学，研究对象主要是社会现象或社会活动，研究目的主要是为了更好地认识社会现象或社会活动，因而其研究属性基本上是社会学研究，或者说可以将其视作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而社会翻译学和翻译社会学作为社会学与翻译学的交叉学科，二者在研究对象上的确有许多重叠之处，然而即使对于同样的研究对象，由于出发点不同，分析方法不同，落脚点不同，其研究性质和学科归属自然也就不同。所以，尽管社会翻译学和翻译社会学之间有许多共性，但二者之间在理论视角、研究对象、研究目的和学科归属等方面的分野也是非常鲜明的，至少在学理上如此。（王洪涛，2016：8；同时见本书第6-7页）

然而，学理上的分析是一回事，实际上学科的发展和名称的使用情况却是另一回事。为此，作者既提到了国内外有影响的人物的学科见解和有关情况，也重点引用了国内有关学者的见解，特别引用了一段分析性文字，具有代表性：

对于中国此类的研究状况，具有社会学专业背景的翻译研究

学者傅敬民是这样评论的：“现在我国许多这类文章都冠以‘翻译社会学’之名。按说这样的名词是偏正结构，前面的‘翻译’是修饰词，后面的‘社会学’才是意义的主体。因此，从字面上看，‘翻译社会学’应该是从翻译的角度研究社会的科学，属于社会学的命题范畴。但是，从那些冠名为‘翻译社会学’的文章内容来看，显然是运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和成果来探讨翻译问题。而这样的研究，若一定要冠以‘学’名的话，也应该是‘社会翻译学’”（傅敬民，2014：102）。（王洪涛，2016：8；同时见本书第7页）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复杂的本末倒置的现象是如何产生的，或者说其背后有无深刻的社会学认识论的原因，才是我认为最为重要的。我以为，以下两点是不言而喻的：

1. 无论学理上的分析基于何种依据，它基本上只是语法学上的分析，这种分析的根据是英语的中心词位置的分析逻辑，即将前置的修饰语作为次要和附加的成分，然而，按照汉语的思维习惯，则是把提前的首要说出的东西视为至关重要的内容（限于修饰关系，而不是陈列关系），所以，“翻译社会学”才有可能成为中国人心目中的“社会翻译学”，即傅敬民所描写的这种情况。当然，从根本上来说，“翻译”和“社会”原本是两个互不相干的词语，单作为名词，都有发展成为学科名称的机遇和条件，所以哪一个都有权利和机会修饰另外一个，将自己置于领先的、决定的位置。这才是这种交叉学科所面临的名称上的二元对立或二律背反的实质所在。

2. 在中国以翻译学为主要学科建构倾向的语境下，特别考虑到中国许多搞这个题目的人都只有翻译学（语言学、外语教育）背景而不是科班的社会学出身（且不说社会学在中国的研究相对于国外要落后许多，在许多时候，把社会学误解为庸俗的社会关系学，是一个主要的社会认识原因，但其背后，对政治学的敏感则是其更深层的政治文化原因），多数人的研究目的和倾向，自然是为翻译研究寻找新的学科依据和经验借鉴，而不是用翻译学的方法解决社会问题，借助翻译学

资料研究社会现象，或者以翻译学为前导解决社会学的出路问题。因此，无论使用何种名称，无论采用激进的变革传统翻译学的立场还是保守的基于寻求翻译文本的语义归属问题的态度，他们的研究目的、课题和方法基本上都在翻译学的领域内。由此引出国内翻译界对社会翻译学或翻译社会学的种种责难和反驳，就不难理解了。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我同意洪涛先将这一争论搁置起来，或者暂且称其为“社会学路径的翻译研究”，然后再不失时机地进入社会翻译学的讨论。

学理的分析固然如此，而当前翻译学界对于“社会翻译学”与“翻译社会学”的普遍混用却是客观事实，现在比较务实的做法是一方面接受“社会翻译学”与“翻译社会学”在翻译学界同义互置的现状，必要时权且概称为“社会学路径的翻译研究”，另一方面仍需进一步明晰二者之间的差异，而将二者的最终取舍留待于该研究领域未来的深入发展，即像沃夫倡导的那样，将其称谓的订立寄托于“对翻译活动和翻译研究社会制约机制的深入探索”（Wolf, 2007: 31）。（王洪涛，2016: 8-9；同时见本书第7页）

在第一个问题得到暂时的讨论之后，让我们来进入第二个问题，即关于社会翻译学研究模式的优缺点的分析。这一部分的分析，更加体现出作者对这一学科的概念的熟悉和资料的掌握程度，而且表现出其长于分析问题的能力。

关于“社会翻译学”研究模式的优点，洪涛提出三点分析意见：

首先，作为一种综合性研究，社会翻译学在汲取各种社会学理论基础形成的研究模式，超越了翻译研究中主体与客体、文本与语境、内部与外部、微观与宏观等一系列的二元对立，融合并贯通了以往翻译研究的语文学、语言学、文化研究模式。（王洪涛，2016: 10；同时见本书第11页）

洪涛认为,社会翻译学研究模式的这种优点源于业已产生的各种社会学理论。例如:布尔迪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所标举的“关系主义”方法论原则,旨在超越传统社会学研究中的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之间的二元对立,对破除社会翻译学研究中内部与外部、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割裂具有特别的价值。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透射出一种要素融于整体、各要素之间相互关联的“整体论”思想。布泽林认为其“系统”可以是任何大小、任何规模,其理论可以支撑宏观、中观、微观的社会翻译学分析。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将社会世界比喻成“无缝织物”,因此“自然与文化、文本与语境、行动者与结构、人类与非人类之间并非是割裂的:它们通过不停的翻译过程,实现了连贯”。另外,社会翻译学研究模式不仅有效克服了以往一些翻译研究模式的弊端,而且其综合性的研究视角也易于将不同的研究模式熔炼在一起。切斯特曼认为翻译研究的社会学视角使得我们关注“一些纽带性的理念”,其中包括因果观念、翻译实践、话语与惯习,以及翻译的规范、指要与策略等,这些纽带性的理念将文本(textual)、认知(cognitive)与文化(cultural)等视角连接起来,而社会学视角“甚至可以朝着‘融合’的目标向前推进,即将不同学科的知识统一起来”。(参见王洪涛,2016:10;同时见本书第11-12页)

这诚然是一些至关重要的社会学理论,对于建立社会翻译学具有奠基的作用。但在我看来,其主要的理论形式,依然是反思性的而非建构性的,也就是说,学科思路的贯通大于基本原理的设定,理论的假设大于分析单位的确立。在这种情况下,我感兴趣的毋宁说是研究类型中所提出的三个层次论,即沃夫根据当前西方社会学路径翻译研究的发展现状,提出的三种类型:“行动者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agents)”“翻译过程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the translation process)”以及“文化产品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the cultural product)”。这一理论,使我想起20世纪末国外有人提出的文艺学的“生产理论”,即关于文学作品生产(不是精神产品的产生和创作过程)、传播(不是传播学意义上的传播)和接受(不是接受美学意义上的接受)的模式,但这一

生产模式，机械地把物质生产、传输与消费的模式搬用于精神产品的产生、传播与接受过程，并且企图在社会运作的过程中加以全部地说明，即物质化的外显的归因和说明，那就不能不说是有问题的。换言之，越是到了“文化产品”一类模糊的说法，越是靠近黑格尔所谓的“精神现象学”一类概念，是人文探索的领域，而非科学实证研究的领域。这一实质性的学科文类问题，至今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换言之，面对一个新兴学科的定位和设想，尽管不能完全墨守既定的学科归类 and 性质判断也不能无视起码的学科归类标准和人类认识与活动的明显界限。由此而言，国内相应的反驳的理由，例如“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仲伟合、冯曼），“文本回归”（赵巍）和“语言（学）回归”（赵彦春针对文化转向所发表的颇具代表性的观点）等问题和质疑，则是第二位的问题。

其次，社会翻译学研究模式的另一大优势，是从社会学中借鉴了大量实证研究方法和其他科学的研究方法，这不仅丰富了整个翻译学研究的方法论体系，同时也利于社会翻译学自身尽早形成具有本学科特色的研究范式。（王洪涛，2016：11；同时见本书第12页）

其三，社会翻译学研究模式深刻揭示了翻译活动的社会属性以及翻译活动背后隐藏的社会运作机制，彰显了译者与翻译活动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同时提升了翻译学科在学术界的地位……众所周知，翻译学科在整个学术界的边缘性地位由来已久，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人们习惯将翻译视作一种语言转换的技术，译者也常常隐匿在翻译文本与翻译活动背后，翻译乃至翻译学科的重要性自然不被认可，而社会翻译学研究模式不仅突显了译者，而且突显了翻译活动在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这自然大大提升了翻译学的社会价值和学术地位。（王洪涛，2016：11；同时见本书第12-13页）

相对于极为重要的第一点，第二点是社会学方法的应用，第三点